

# 难忘，在巴金故居温暖的时光里

陆正伟

我每次到巴金故居，仍怀着十多年  
前看望巴老时的那份愉悦。看到沾满  
巴老手泽的桌椅板凳等家具物件，依旧  
摆放原处，一成没变的陈设尤感亲切。  
如让我在展品中选一件最为熟悉的物  
品，不用说，非巴老坐的那辆多功能  
轮椅莫属。

1. 1995年，巴老胸椎骨折尚未痊愈，又因体位性低血压引起脑供血不足，严重时会造成突然晕厥。于是，医生建议他在血压下降时除了用药外还可采取物理措施，即马上躺平应急。可是，巴老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轻易卧床休息的，连吸氧这样的小事也是经大家左说右劝才勉强同意。因此，只能在他的那辆“坐骑”上打主意了。于是换下此前法国朋友送的轮椅，找上海轮椅厂为巴老定制了一辆可坐又可躺的轮椅。这招还真管用，有几次巴老出现血压异常波动，情急之下放下轮椅靠背让巴老躺下，并抬高腿部，不多时就化险为夷了。

巴老坐上这辆轮椅，不仅出席过中国作协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九次主席团会议，还参观过上海图书馆。1997年5月8日，他坐着轮椅，饶有兴致地把上图淮海中路新馆上上下下看了个遍。当我跟在巴老的轮椅后面来到金石书画室时，看到玻璃展柜内陈列着历代文人墨客的书画佳作，琳琅满目，不知从何看起。此时，讲解员指着一幅书法介绍道：“这幅字是清乾隆年间大学士刘墉（号石庵）的手迹，就是被称为‘刘罗锅’的那个‘宰相’。那阵子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剧情中的嬉笑怒骂逗乐了市民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连巴老也与我们几个年轻人每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

此时，巴老见大家向刘墉的那幅字围拢过去，便和我说起他与“刘罗锅”的旧事。他祖上本来有不少古董字画，可都在战乱中散失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九姨婆如（即九姑妈）从成都老家带来几件祖传老物件，其中有刘墉一幅字。没过多久，这幅字被巴老捐献给了国家。我听后问道：“当时捐给了哪家单位？”他说：“给了文化局。”

此前，我从友人口中得知他在八十年代初捐给家乡成都慧园一批藏品，其中光名家书画就有吴作人的《熊猫图》、关山月的《山青天碧水流溪》、贺天健的《家乡京溪水边》等精品力作，此外还有一对上了年头的彩瓷鼓凳及巴老的三哥李尧林就读燕京大学时获得的“金钥匙”……

这些捐献的家藏，可说件件有故事，譬如创作《家》时的那张命途多舛的书桌。在“一·二八”抗战中，日寇的炮火殃及闸北宝山路上的巴金住所。此时，他幸好从南京返沪的途中。过后，在宝光里的残垣断壁中，他同朋友索非搬出了书桌并找到几页《激流》（即《家》）残稿。这张随巴金搬过五六次家的桌子，最后“落户”武康路113号寓所厨房里，用来摆放锅碗瓢盆等炊具，有时还成了切菜的操作台。一次，清扫卫生的阿姨见破损的桌子有碍观瞻，取废的锅铲正缺引火柴，便把它“请”出厨房。正准备将它大卸八块时，巴老女婿祝鸿生看到了，赶紧上前劝阻说：“使不得，你可知道，这是老先生写《家》时用的书桌啊！”真庆幸，幸而从炉膛口拦下了这件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

巴老参观完上图后，工作人员引领坐在轮椅上的巴老到楼梯口的玻璃栏板前，让巴老俯视安静的大厅中川流不息的读者。读者有的在搜寻资料，有的在查阅卡片，有的在触摸屏上点击索引，更多的读者手捧书本品读。巴老在轮椅上观望良久，若有所思……

两天后，巴老向医生请了假，在小林的陪伴下回到寓所。进门后，他让助理小吴把轮椅推进客厅，径直来到“阳光房”，察看准备捐给上图的外文书，这批书都是巴老与外宾交往中获赠的及上访带回来的精品书。巴老看后没吱声，停了一会，叫小吴把车推回客厅，面对书橱，一会儿让我打开这扇橱门看看，一会儿要我拉开另一扇橱门朝里望望。小林见了问道：“爸爸，你在找啥？”巴老说：“这些书不够，再增添些。”小林说，再从三楼书库拿些外文书下来？巴老点点头。



记录

于是，我同徐钤、陆盛华、胡嘉灏等几个上到三楼，从书架上抱了一摞摞书下来，几个来回，忙得出汗。躺在轮椅上休息的巴老见我们搬下的书堆得如小山似的，才露出了满意笑容。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回家。

这辆轮椅不仅是巴老的代步工具，有时也会躺在车上边吸氧，边听别人给他读书报。在杭州汪庄养病时，工作人员见巴老读书写字不方便，特意制作了一块小木板架在轮椅扶手上。我曾看到他在那辆简单而灵活的“工作台”前与女儿小林一起背诵鲁迅先生的诗；也见过他在轮椅上为老舍百年诞辰纪念题词；还泪眼草拟悼念夏公的唁电和撰写缅怀曹禺的文章；也看到给老友萧乾书写生前最后一封信，及口述《巴金译文全集》序跋……

一次，我进门见陈思和教授和杨晓敏编辑站在轮椅前与巴老说着话，面前摆放着一叠新书。原来，巴老陆续写的五十多篇“随想”及《巴金译文全集》序跋结果出版了，他俩来给巴老送样书。此时，巴老拿起新书《再思录》边翻看边说道：“这书写得不错，如身体好的话，争取再写一点，书名就叫《三思录》吧。”这本《再思录》就有部分文章在这部轮椅的“工作台”上写的。

如今，巴金故居将巴老创作过《随想录》的缝纫机和写过《再思录》的轮椅一同陈列于“阳光房”。

2. 巴金故居的客厅中央依旧围着一圈沙发，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淮海坊搬来时巴老夫人萧珊添置的。巴老在此以文会友，曾接待过数不清的中外宾客。客厅的装饰柜里陈列着来宾们赠送的各种纪念品；书橱里照旧排列着友人的签名书；墙上仍挂着画家林风眠在1964年赠给巴老的那幅《鹭鸶图》……

九十年代初期，我在客厅前后见过苏联政府颁给巴老“人民友谊”奖章的场面和巴老会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的情景，这些活动都被我摄入了镜头。翻看所拍摄的相片，客人中来得最为频繁的还数水上勉、中岛京子、古川万太郎，可说一漂亮的话，她用朴实的言行打



友人于田是也和栗原小卷

二〇一五年六月，栗原小卷为巴金故居留言

# 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谭然

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容徐俊先生的，大概是外地朋友到北京来约了大家一起聚会，握手致意时徐先生便夸我写的字，他说在别处看到我题的斋额，让我给他也写一个。当时吓我一跳，平时涂鸭玩而已，在长辈面前怎么敢造次。当时的徐先生已经满头银发，乍一看让人误以为是位老先生，大家称呼他“容老”，可是交谈之中让人觉得他并不老，举止敏捷而有活力，言谈又充满真诚和热情，没有让我感觉到这是初见时一般的寒暄和客套。又听有人称他“徐总”，交谈之下，他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徐先生，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

其实之前在网上看过徐先生写的字，仿佛一阵春风扑面，及至拜见本尊，果然字如其人。光看图片，一眼就会觉得字写得好看，笔画干净，间架稳妥，写得隽秀、典雅。再看原迹，笔画的厚重自然跃入眼帘，每一笔是扎扎实实写出来的。后来有机会看徐先生挥毫，下笔之际，毫无迟疑，速度并

不慢，讲究顿挫，笔与笔之间，牵丝映带照顾得很好。无论在生纸还是熟纸上，大字小字都潇洒，一纸写完，又不会让人觉得飘，这是最让我佩服的地方。如同吃一道好菜，清淡之中复现醇厚，方可见庖者的高明。字写得好看并不难，可是好看之后耐人寻味就不太容易了。孙过庭《书谱》里面说“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大略如是。

初见徐先生时，我不知道他身肩重任，平时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诸如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这样的“千秋大业”只是其中之一。除了在六里桥中华书局坐镇指挥之外，还要不停地出差，开会，接受采访，等等。即使我在北京常住时，一年差不多也只见一两次，大多是朋友约了吃饭才能聚聚。尽管见面少，每一相晤总是很开心。有一次和徐先生聊天说起给出版物题签的事情。他心目中有个“十大好签”，其中一个就是徐先生著作《先秦诗文史》题的。我马上想起当年

动对方的心……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见《再谈〈望乡〉》）从1978年12月3日的首篇“随想”到1986年12月3日栗原小卷到寓所探望巴老，相隔恰好八年整。此间，巴老克服病痛和各种干扰，完成了150篇说真话的五卷本《随想录》……

2015年初夏，栗原小卷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的名义访问上海，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是带着缅怀之情走进巴金故居的。我在微信上看到她在巴金故居参观并在巴老那幅发绣像前驻足凝视。当年报道巴老与栗原小卷难得的相逢的《文汇报》记者汪澜，这次以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的身份陪同栗原小卷参观。福地重聚，在客厅里聊起当年的情景，分外亲热。也许栗原小卷找回已过去将近三十年的那温馨一刻，我从两幅照片上看到她仍坐在曾坐过的那张沙发上。她左手边摆放着巴老写《随想录》的小书桌和靠背椅，五卷《随想录》和笔摊放在桌上，让人感到巴老只是有事稍作离开……

巴金故居得知栗原小卷重访故地的消息后，特意以高仿巴老的《谈〈望乡〉》手稿相赠。我见照片上的栗原小卷戴起了眼镜翻看着手稿。我马上想起与之类似的一件往事。巴老在写《谈〈望乡〉》的半月前（1978.11.14），让一位素不相识的工人业余作者宗福先拿着他写的推荐信，到北京登门拜访了曹禹先生，促成了这位创作《于无声处》的青年编剧与戏剧大师彻夜谈心的佳话（参见2022年8月7日“文汇报”《巴金给曹禹的一封信》）。《于无声处》这部话剧同样也遭受过像电影《望乡》那样的非议和责难。巴老不仅力挺这部话剧，他还在《谈〈望乡〉》一文中提及：“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他在《随想录》的开山之作中为电影《望乡》正名；也为进京演出的话剧《于无声处》叫好；更是在为青年一代鼓与呼。巴老的两篇“随想”确像第一只燕子，在乍暖还寒时就报以春将来临；这种敢为人先的勇气，着实让人敬佩。

不久前，我看到栗原小卷在重访巴金故居时的日文题词：“今天访问了尊敬的巴金先生故居。栗原小卷。2015.6.13。”她把在巴金故居度过的温暖时光定格在留言簿上了。三个月后，在日本庆应大学举办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巴金与日本作家的文献图片展览暨学术研讨会”上，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栗原小卷朗诵了巴老的《谈〈望乡〉》《再谈〈望乡〉》文章片段。洋溢中日两国人民友情的故事在延续……

写于2022.11.25

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招收研究生。当年古代文学录取的五位学长业务和政治情况都非常优秀，有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的记者，有北京市知名的中学老师，有烈士家属。但年龄偏高，都是我们的老师辈。

1954年这一届，据说教育部要求招应届毕业生。我本科毕业，原想赶快工作，可以帮助家庭解决部分经济问题。当时，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找我谈话，说目前师范类高校发展很快，急需教师，要我报考研究生。我就报了古代文学。报名时，名称是“副博士研究生”，入学后，赶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副博士”这三个字；而且要求取消导师制，要教研室组织指导组集体指导。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指导组，由谭丕模、刘盼遂、李长之、王汝弼、启功等五位老师组成。我实际上始终由李长之老师指导。公共业务课程只安排了刘盼遂老师给我们上。而且明确宣布，在刘老师家里上，老师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我们每三、四个星期上一次课，下次上课时间由刘盼遂老师在每次课后与我们约定。后来，大家知道这是给我们讲古代文学相关的基础知识，有点像启功老师后来给他的研究生开的“猪跑学”（民谣：“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刘盼遂老师像是随意安排教学内容。但现在回想起来，老师实际上是非常认真地为我们组织了这门课程。第一次课，我们到老师家，上课在堂屋正中。堂屋一般在住宅的院落中，位置处于正中。但这个院落并不规范，不是四合院，是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房子质量也一般。堂屋紧靠大门，是北房5间。中间一间北面墙壁上挂着中堂画，两侧是梁任公亲笔书写的一副对联。然后靠墙是条案，再前面是八仙桌，右侧是太师椅。这是北京民居一般般的陈设。西边是老师的工作间，东边是暗室。老师没有坐在八仙桌的右侧正座，而是坐在西侧。前面安排两排椅子，我们共五个人——可永雪、陈玉璞、许可、王冰彦和我，分坐两侧。开始自然有一点拘谨，但随着刘老师平易的态度，大家也就放松了。

老师主要讲他考清华国学院的经过。他说：报名后，他就每天泡在琉璃厂看王困维先生、梁启超先生的著作。自己思考先生著作中的主要研究内容、方向，哪些问题是老师的主要成果。那时琉璃厂书多，想看的书都有，而且比图书馆方便，从早到晚，什么时间都可以取书，也不用办借书手续。经过约一个月的准备，他思考的题目竟然与考题相合。入学后，自己开始笔录《说文解字》，进行点读。后又取《说文》九千字，依声比次，成《说文声谱》，又取《说文》重文

# 忆刘盼遂老师

李修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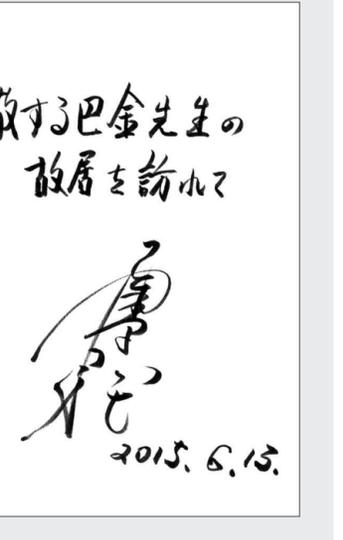
一千一百六十三言，别为三部：“重形字”“重义字”“重声字”。当时，国学院是一年毕业。老师在清华研究三年，毕业三次。中间还会在曲阜任教。国学院四位导师，入学时只有三位在任：王国维（1877—1927）、梁启超（1873—1929）、赵元任（1892—1982）；陈寅恪（1890—1969）还在美国，李济（1896—1979）为特别讲师。赵元任常赴各地调查方言，李济之先生出外主持发掘或赴美参加考古学术会议，两先生每学期回院讲学不过数周。所以刘老师的导师就是王国维、梁启超。刘老师也穿插讲些轶事，说：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位老师作风迥异。如果你问王老师问题，他多回答“弗晓得”；如果问梁老师问题，无论什么问题都会给出详细的回答。我当时以为是趣谈。过后思考，不像是趣谈。对照老师记录上课的笔记，才明白其深意。老师在《观堂学礼记》的《序》中说：“大抵服其树义恢廓郭微，而能阙疑阙殆，以不知为不知，力别向壁回穴之习。此则马、郑、江、段之所未传，询称鸿宝。”老师在《梁任公先生传》中说：先生当时便患症日剧，日卧药裹炉烟中，而批校笔削析疑义不少休。这样的精神是激励学子应“闻风而起起孟晋者哉！”（《刘盼遂著述集》）。

在以后一年的教学中，老师讲了二十四史、永乐大典、文选、方志等课题。讲了整理的《世说新语》《颜氏家训》《论衡》等。我印象较深的是讲《颜氏家训》《论衡》、百衲本二十四史和永乐大典。老师讲读任何一部古籍，首先要注意版本，要明辨书中文字的真伪、正误。在此基础上，还要辨析作者所处的时代因素和作者本人的地位、处境、思想，才能准确理解文意。而且还要注意古籍可能受到后世建构、附增、编订等活动的塑造。方志本应崇实，但实际却多虚美，有的甚至不可依据。对于研究者的作品也要辨析。老师讲课不是正襟危坐，还经常讲些笑话和轶事，如他和书商打麻将，及一些馆臣偷着将书拿出官等轶事。

老师在陶然亭建园期间担任顾问。园内有不少墓葬，建园时都被清理出园。老师提出，高君宇的墓不能搬迁，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曾是李大钊学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在莫斯科出席会议时，曾与斯大林在同一党小组。高君宇因急性阑尾炎逝世后，葬在锦绣墩的北侧，坐南朝北。他的墓是石评梅给修的，墓碑上刻着高君宇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石评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体育教师，也是著名的女作家。石评梅与高君宇是恋人关系，没有结婚。石评梅的墓是她哥给修的，在并列的位置，但墓碑是坐西朝东。现在，此墓地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老师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宣部、教育部组织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散文选》的主编。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在民族饭店召开的会议中用餐后，他拿了一个馒头带走，说：“我给老伴带一个馒头吃。”按规定是不允许外带食品的，但一个馒头放在书包中，也无人过问。此事的处理可见老两口的感情，让人泪目。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曾出版石评梅辑校的《刘盼遂文集》，202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辽海出版社又出版了朱小健、周笃文、刘小瑾主编的《刘盼遂著述集》。积极操办此书出版的马千里编著的《刘盼遂先生年谱》也将问世。现存著作，虽不是全璧，固自精光夺目。回忆往事，甚愧愚钝，很遗憾自己没有完整记录老师讲学的内容，仅有的片断笔记、日记，也早已在五十多年前被毁掉……



尊敬了巴金先生の故居を訪問し

二〇一五年六月，栗原小卷为巴金故居留言

休息时间，偶一问及，徐先生总是笑着说写字很快。尽管有的只是小小一张诗笺，写上三五个字，录一句词或一句诗，拿来抒怀赠人，无不贴切。这大概都要归功于先生多年以来在古典文学、古代文献、敦煌学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修养吧。

去年年初徐先生将要荣休之际，上海的好友在洒金红笺上写字奉贺，并约我同献一纸，我琢磨几天，不揣陋陋，也拟了副对联，词曰：金瓯鏖鏖为子寿，江乡云水待公归。徐先生忙着整理出版古籍文献，工作这么多，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有更多的闲暇写写字，看看书。徐先生的老家在长江三角洲之上，地处润扬之间，虽然久居北地，但是每每谈到故乡风物，总是绘声绘色。又是一年“竹外桃花三两枝”的时候，江风吹来，春水如蓝，徐先生笔下的一字一句必然更加韵味悠远，耐人寻味了。

癸卯二月既望山中看花归来写于泉城白沙河上